

宋初经由丝路敦煌的中印佛教往来、中印贝叶经及作为图像学范本的贝叶经插图的流通与《八塔变》图像样式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北宋初年包含密教义理的佛教在宋辽西夏的兴起，佛教经典如《八大灵塔名号经》的传译、往来中印之间汉梵僧人的求取或馈赠贝叶经的热潮，将插图丰富的新式贝叶经佛典《般若波罗蜜多经》引入中土，创造了莫高窟等地的八塔变图像，成为宋初的新经变。本文拟从讨论敦煌莫高窟 76 窟东壁《八塔变》壁画入手，探讨《八塔变》所据经典及其图像的东印度波罗艺术原型，从而管窥宋初中印文化交流之一斑。

现今的八塔变，最早见于敦煌莫高窟 76 窟壁画中。该窟最初为唐窟，宋元时重修，现今窟室甬道、窟门宋夏风格浓郁。窟室位于崖面底层，下半部壁画水浸毁损。在窟前壁（东壁）上方贯通画飞天十铺，下方门上绘七宝象征七佛。两侧门南、门北画《八塔变》两排，下排图像因渗水而残毁。非常难得的是壁画有详尽的汉文榜题文字并标明八塔的次序：上排南起分布为第一塔释迦降生，第三塔初转法轮，门北为第五塔降服六师和第七塔猕猴献蜜（见中插图 1、2）^{〔1〕}，八塔的顺序是由右至左，先上后下。右上第一为降生，左下最后为涅槃，可见是按照由左而右，由上而下的汉地叙事画线索安排情节的。示意图如下：

莫高窟 76 窟《八塔变》位置图

飞天十身				
第七塔 猕猴献蜜	第五塔 舍卫城神变	七宝	第三塔 初转法轮	第一塔 降生兜率
无存（第八塔涅槃）	无存（第六塔）	窟 R 门	无存（第四塔）	无存（第二塔）

从图像式样分析，与该窟现存南北壁壁画《法华经变》与《华严经变》、甚至密教意味的《观音经变》的宋代汉风样式不同，《八塔变》壁画具有的东印度波罗风格（Pāla Style）、或者说波罗母题（motifs）非常明显（见中插图 3、4），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塔龕两侧的狮羊立兽（vyalaka），这种立兽在波罗艺术中出现于 9 世纪，西藏艺术中现存最早

『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

莫高窟七六窟八塔变图像的原型

谢继胜 于 硕



的狮羊例证出现在 11 世纪后半叶的卫藏(藏区中部)寺院,如大昭寺和艾旺寺,并多见于 12 世纪的唐卡,在西藏西部 13 世纪的石窟壁画中也偶有发现^[2],是阿底峡(982-1054)入藏前后传入卫藏的波罗艺术中具有断代意义的母题之一;波罗样式的另一个标志是胁侍立姿菩萨,着三叶或五叶头冠,高发髻,璎珞严身,臂长及膝,手心、脚掌施红,超短红色犊鼻裙裤(dhoti),双脚并向主尊一侧,与躯干形成婀娜扭转,或者将人物置于龕内形成框式构图等。观察第 76 窟《八塔变》,虽然图像画法已汉风浸淫,但波罗母题清晰可辨,写实化的狮羊如同大角山羊,羊背攀援的小童有如成人,羊下承象,为“六擎具”的早期样式。例如第七塔“猕猴献蜜”,塔龕中释迦汉装佛衣,右侧胁侍菩萨戴三叶冠,双手合十作印,短裙裤,双脚似并向一侧。龕外“菩萨声闻从佛会时”一侧两位菩萨,第一位右手与愿印,左手长过膝,似执莲茎,典型波罗莲花手观音身相;右侧菩萨亦双手合十,身体扭转深得波罗神韵,双脚并立虽不如 12 世纪胁侍菩萨典型,但仍可确定并向一侧,与后藏夏鲁寺早期壁画波罗菩萨画法非常相似(见中插图 5)^[3]。《八塔变》佛塔的样式同样是莫高窟新的佛塔形制,与卫藏 11 世纪的塔龕,如艾旺寺残存的塔龕样式相似(见中插图 6、7),但塔刹两侧的飘幡又是汉地晚唐五代长幡的样式。^[4]

《八塔变》图像是敦煌壁画中宋至西夏时期涌现的题材,此经变画在 76 窟出现与全窟壁画的图像配置有关,或与宋夏 11 世纪前后密教的复兴有关,更与辽人华严入密、造塔奉佛的信仰关联。该窟十分突兀的波罗样式佛塔经变画位于东壁窟门两侧,主壁(西壁)图像无存,南北壁《法华经变》对《华严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对《十一面八臂观音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对《药师经变》^[5]。南北壁中铺构成的一组《观音经变》是敦煌

壁画仅见的经变样式,与八塔变图像作为新样式的出现相呼应。敦煌研究院将此窟壁画确定为北宋,年代在公元 10 世纪。事实上,唐代敦煌流行有以佛陀事迹劝诫世人的变文,如《八相变》、《八相押座文》等^[6],但并未形诸绘画,宋以前敦煌石窟中完整的八相图极为少见^[7]。以八塔结合八相为表现形式的“八塔变”,敦煌石窟壁画中出现的时间就是 76 窟《八塔变》绘制的时间,考虑到卫藏与辽、西夏的八塔八相题材的实例,笔者以为 76 窟壁画的年代在 10 世纪末至 11 世纪上半叶,原因是此时汉地及辽夏等地密教的短暂复兴所致的相关仪轨的流行、经典的传译和插图贝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佛教图像的传播,如宋时迦湿弥罗人法贤(天息灾)译《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藏文经名 gnas chen po brgyad kyi mchod rten la bstod pa, 梵文经名 Astamahāsthānacaityastotra)与《八大灵塔梵赞》(藏文经名 gnas chen po brgyad kyi mchod rten la phyag vtshal bavi bstod pa, 梵文经名 Astamahāsthānacaityavandanāstava)^[8],此经的汉译对八塔信仰在辽夏的传播有重要作用;其次是印度留存的佛教文物表明,波罗王朝在 10 世纪后半叶至 12 世纪流行金刚座降魔印释迦牟尼成道像石刻,流行一大塔两侧配置四座小塔构图的八塔擦擦(见中插图 8、9)^[9],流行基于《般若波罗蜜多经》佛陀圣地说法的义理、描绘圣地与圣迹的贝叶经插图“八相图”,趁金刚乘佛教曾在西域敦煌一带传播的余绪与方便,以卫藏波罗的图像样式进入汉地密教的图像体系内,但波罗式样的八塔图像如何在 11 世纪前后进入敦煌,是颇费思量。考虑法贤 980 年入中土,1000 年圆寂,上述经典在 10 世纪后半叶译出,而经典至图像的出现尚需时日,中土出现以八塔或八塔变相表现释迦牟尼事迹的佛传内容当在 10 世纪后半叶至 11 世纪上半叶,所以莫高窟 76 窟的年代判定应当是合理的,壁画主榜题上方的梵文悉昙体真言和描述佛陀事迹的

汉文文字风格也支持壁画年代的推定;与此同时,76窟壁画塔龕两侧的狮羊、胁侍菩萨扭转的身姿、犍鼻短裙、加长的手臂和施红及掌心等确定无疑的风格特征,都表明此处的八塔变图像来源于东印度波罗样式!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现今存世的、作为八塔变图像源头的梵文贝叶经八大圣地插图的年代大都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甚至13世纪初,与76窟壁画的年代同时或略晚。例如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贝叶经《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经》插图,断代在1115年^[10],虽然东印度作为佛教书籍的贝叶经出现较早^[11],但插图《大般若经》贝叶经的形成与中亚吉尔吉特(Gilgit)等地早期大乘信仰的晚期流行有关,其装帧形成一种新的样式亦与中亚地区相关^[12],年代在10世纪以后。帕尔教授认为,《般若波罗蜜多经》插图贝叶经在波罗朝集中流行在1000至1200年,此前的佛经没有插图。插图贝叶经绘制的内容是大乘或金刚乘佛教的神灵和表现释迦牟尼事迹的八大圣地或圣迹(见中插图10-17)^[13]。不过,东印度波罗朝贝叶经《般若波罗蜜多经》保留了西域早期大乘的四相图,因此贝叶经插图单叶多见四塔,通过多叶展示八塔的内容^[14];八塔擦擦内中央的大塔并未包括在八大法行之内,两侧八小塔象征八相。

必须强调的是,最初东印度八塔变的宗旨与《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宗旨相符,是让信众了悟佛

教智慧波罗蜜而非展示佛陀的生平,但进入中亚和丝路敦煌的八塔八相图则融入了早期大乘佛教对释迦作为圣者的尊崇。八塔图像在13世纪以后画面构图趋向于复杂化,成为表现本生故事的一种形式,在于展示佛陀神奇的一面,成为佛教思想的图解形式。从来源考察,东印度八塔八相图的形成似乎有两个途径:贝叶经插图与页岩石雕金刚座成道像(见中插图18)^[15],贝叶经提供了个体或单列的八相景象或场景,石雕构图则将八相场景集中在一幅图像中,但石雕中没有表现完整的八塔,八塔形象得自于八塔擦擦,所以八塔变和八塔八相唐卡的直接源头或是11世纪至12世纪的东印度石雕、贝叶经插图与八塔擦擦三者结合而形诸绘画的新样式,标准粉本是现今传世的“卫藏”八塔八相唐卡(见中插图19)。^[16]

我们在讨论11世纪的敦煌艺术或敦煌艺术与西藏艺术的关系时,大家更多的考虑吐蕃的灭法所致的汉藏与印藏宗教以及宗教艺术联系的断裂,重视西藏佛教艺术对汉地佛教艺术的影响,对11世纪前后吐蕃与西域敦煌之间的联系由于找不到确凿的藏文史籍的印证而痛苦不堪^[17]。此外,佛教艺术史家对唐代中印之间的交流,对于往来于丝路的玄奘等行脚僧三藏关注有加,但对宋初中印之间的佛教及其艺术的交流史实视而不见。事实上,北宋初期,唐末动乱所致寂寞的丝路随着宋初社会的安

定,古道又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往来大漠的印藏僧人的数量超过了前朝,皇室甚至一次派出300人之众的取经团,很多僧人在印度逗留数年,在东印度、甚至克什米尔都建有汉僧的寺院并立中文石碑纪念取经行程^[18],这些僧人到盛产贝叶经的东印度的目的就是请回梵夹贝叶经,他们前往印度的时间恰好在波罗朝开始制作插图贝叶经的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集中



莫高窟第76窟东壁南侧“八塔变”第一塔释迦降生第三塔初转法轮

在 11 世纪后半叶^[19]。汉僧在印度拜访释迦牟尼八大圣地,回程取道尼泊尔经西藏返回丝路故道,途经瓜沙诸州回到京师与故地^[20]。我们观察到这些取经僧人活动的年代也就是 76 窟突兀样式壁画出现的时间!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记:

乾德三年(963),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936-944)诣西域,在涂(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还经于阗,与其使偕至。太祖召问所历风俗山川道里,一一能记。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布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开宝后(975),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

范成大《吴船录》记载了峨眉山牛心寺方丈继业三藏往返印度取经的详情:

此寺即继业三藏所作。业姓王氏,耀洲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962),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976),始归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理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阙。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食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又度大葱岭、雪山至伽湿弥罗国,西登大山,有萨埵太子投崖饲虎处,遂至健陀罗国,谓之中印土。又西至庶流波国及左烂陀罗国,国有二寺。又西过四大国,至大曲女城,南临陷牟河,北背洹河,塔庙甚多而无僧尼。又西二程,有宝阶故基。又西至波罗奈国,两城相距五里,南临洹河。又西北十许里,至鹿野苑,塔庙佛迹最伙(业自云别有传记,今不传矣)。南行十

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图。

自鹿野苑西至摩羯提国,馆于汉寺。寺多租入,八村隶焉。僧徒往来如归,南与杖林山相直,巍峰岿然。山北有优波鞠多石室及塔庙故基。南百里有孤山,名鸡足三峰,云是迦叶入定处。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宝座城,四门相望,金刚座在其中,东向。又东至尼连禅河。东岸有石柱,记佛旧事。自菩提座东南五里,至佛苦行处。又西三里,至三迦叶村及牧牛女池。金刚座之北门外,有师子国伽蓝。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说《宝云经》处。又自金刚座东北十五里,至正觉山。又东北三十里,至骨磨城。业馆于虾罗寺,谓之南印土。诸国僧多居之。又东北四十里,至王舍城。东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东北,登大山,细路盘纡,有舍利子塔。又临涧有下马迎风塔。度绝壑,登山顶,有大塔庙,云是七佛说法处。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鹫峰,云是佛说《法华经》处。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址,有温泉二十余井。又北有大寺及迦兰陁竹园故迹。又东有阿难半身舍利塔。温汤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复有毕钵罗窟。业止其中,诵经百日而去。窟西,复有阿难证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会。新王舍城有兰若,隶汉寺。又有树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轮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陁寺。寺之南北,各有数十寺,门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东北十五里,至乌岭头寺。东南五里,有圣观自在像。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东七十里,有鸽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毗耶离城,有维摩方丈故迹。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罗聚落。踰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

太祖已宴驾,太宗即位。业诣阙进所得梵夹舍利等,诏择名山修习。登峨眉,北望牛心,众峰环翊,遂作庵居,已而为寺。业年八十四而终。

范成大《吴船录》所记乾德二年三百僧人入印取经事或与《宋史》所记僧行勤等 157 人乾德四年入印取经事相关,但范成大撰《吴船录》时离史实发生时间不远,且言之凿凿,或许其余不在册的僧人加入了当时的赴印僧团也不无可能。考虑到赴印僧人主要在于拜谒东印度佛教八相图表现的八大圣迹,求取以《般若经》为主并绘制有佛陀圣迹的贝叶经;考虑到此时法贤翻译记载天竺佛画仪轨的《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21]以及菩提伽耶的僧人 11 世纪初将“唐卡原型”的东印度布画的粉本“白氍毹上本”携入中土^[22];考虑到汉梵行僧旅途经由沙州和瓜州,且往来中印的年代在 11 世纪上半叶至 11 世纪中叶等等史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莫高窟 76 窟颇显突兀的波罗风格的《八塔变》是这些僧人从印度携回的新样式^[23],与此时在吐蕃本土兴起的卫藏波罗式样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这段时间在藏区腹地缺乏西域“末法”时代建塔追寻舍利的氛围,很难找到与八塔变完全相同的风格样式。西夏人 1032 年控制沙州以后,其佛教绘画继承了《八塔变》样式,仅从年代来说,76 窟似乎可以归入西夏早期的石窟,这一初期的波罗样式在西夏艺术中被延续下去,因此黑水城出现了很多的八相成道图,出现了东千佛洞第 5 窟、榆林窟第 3 窟的八塔变相,这一图像样式在同时期的西藏艺术中是很少见的,相关藏文文献在提到以汉式风格建造的殿堂壁画时记载绘有与《般若波罗蜜多经》、《涅槃经》相关的八塔图像,如《巴协》、《第吾教法史》记载桑耶寺按照汉地样式建造的中层转经廊配殿依据《涅槃经》绘制了八塔变^[24],特意指明这种样式是汉地样式,其中绘塑的护法神都用汉字的音译“金刚”或“哼、哈二将”。此外,八塔八相图像绘制

在二层礼佛廊道配殿,看出壁画是作为佛陀事迹供信众顶礼而非特定的密教仪式用途。观察 11-12 世纪的卫藏艺术,无论是艾旺寺,还是夏鲁寺初期作品,在具有东印度波罗样式的同时具有一种中亚西域的“敦煌”或“于阗”风格。这一风格或与 11 世纪往来中印的僧人相关;他们将波罗样式带到敦煌的同时,也可能将敦煌的样式携入卫藏。前文叙及范成大《吴船录》提到“踰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说明继业等是进入尼泊尔后到“磨逾里”,与此接壤的地区即穆斯塘(Musthang)^[25],穆斯塘及周边地区藏文称为 mang-yul,准确对音 man-g-yu-l“磨逾里”,其地指阿里普兰至后藏昂仁、定结、吉隆、康马县等与尼泊尔、不丹交界的地方,可见《吴船录》史料确凿可靠。此时再提及过“雪岭”至“三耶寺”,不排除就是山南的桑耶寺(bsam-yas),因为从吉隆翻过雪山就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顺流而下,可以极为方便地到达桑耶寺及吐蕃匹播城(今山南琼结)。所以藏文史书提到桑耶寺汉地样式的八塔八相图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或与此次拜谒有关,后藏康马县艾旺寺(I-wang)、聂萨寺(gnas-gsar)等寺出现的于阗敦煌式样或许也和这些来自丝路的僧人有关。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9 年度重大项目”《敦煌藏传石窟壁画与吐蕃、西夏美术》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09JJD770019。作者:谢继胜,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教授;于硕,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 释】

[1]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文物出版社 1987,图版 106-109。

[2] 霍巍著:《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中的波罗艺术风格》,《考古与文物》2005 年 4 期。

[3] 如夏鲁寺马头殿壁面上方 11 世纪绘画,作者摄影。

[4] 艾旺寺塔龕图版参看 Robert Vitali,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pl.28, Serinda Publications 1990。

[5]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文物出版社 1987,第 261 页。

[6] 王重民著:《敦煌变文集》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7] 现今所见最早的完整的八相图是出自吠舍离的石刻八相图,很多学者认为此作品年代是 5 世纪(宫治昭《印度美术史》页 128,吉川弘文馆)笈多风格的雕塑,苏珊·亨廷顿认为此石刻风格与 Gurjara-Pratihāra 时期的雕刻风格非常相似,其年代当在 8 世纪。笔者倾向于后者,因为这件八相图与此后出现的八相图实例有很大的年代空白。参看 Susan L.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 Weather Hill, 1985, p.459。

[8] 《大正藏》No. 1685《佛说八大灵塔名号经》,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明教大师臣法贤奉诏译。“尔时世尊告诸苾刍,我今称扬八大灵塔名号,汝等谛听,当为汝说。何等为八?所谓第一迦毗罗城龙弥你园是佛生处;第二摩伽陀国泥连河边菩提树下佛证道果处;第三迦尸国波罗奈城转大法轮处;第四舍卫国祇陀园现大神通处;第五曲女城从忉利天下降处;第六王舍城声闻分别佛为化度处;第七广严城灵塔思念寿量处;第八拘尸那城娑罗林内大双树间入涅槃处。关于法贤,参看吕澂《天息灾、法天、施护》,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二卷,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年,第 233-236 页。

[9] 参看上海博物馆编:《古印度文明:辉煌的寺庙艺术》96 页图版 1:26,现藏大英博物馆。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

[10] 艾米·海勒著,赵能、廖旻译:《西藏佛教艺术》第 65 页,图版 2-14,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11] 唐·杜宝著:《大业杂记》云:“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

[12] D. Klimburg-Salter, "The Gilgit Manuscript Covers and the Cult of the Book",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87*. Part 2, M. Taddei, P. Callieri eds., Rome, 1990: 815-830。

D. Klimburg-Salter, "Notes on Two Gilgit Manuscript Cover paintings", in: *The Art of Ajanta. New Perspectives*. Volume 2, R. Parimoo and alii eds. New Delhi, 1991: 521-535。

[13] 帕尔著:《佛教经书插图》一书对作者熟悉的东印度插图贝叶经有极好的叙述。Pratapaditya Pal & Julia Meech-Pekarik, *BUDDHIST BOOK ILLUMINATIONS*, Ravi Kumar Publishers, 1988, pp.45-134。

[14] 《大般若经》(vphags pa 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chen mo/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

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译,600 卷,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梵本多数仍存。全经分四处(指佛陀在王舍城的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王舍城竹林精舍说法的四个处所)十六会。早期的四相图,典型例证如德国柏林亚洲艺术馆藏 7 世纪前后克孜尔石窟第 205 窟甬道侧壁《阿闍世灵梦图》图右上方画行雨大臣双手张开绘有佛陀一生化迹的布画,描绘出释迦牟尼树下降生、鹿苑说法、降魔成道及双林涅槃四个画面。

[15] Susan L. Huntington, *The Art of Ancient India: Buddhist, Hindu, Jain*, Weather Hill, 1985, pp.395-96. Pl. 18.9. 石雕出土于比哈尔邦的那烂陀,现今的 Jagdi Ipur。

[16] P. Pal 谈到所谓卫藏时期的这两幅断代在 12 世纪八塔唐卡,据称极有可能是在卫藏某寺院绘制的,很可能施主就是噶当派的上师,但令人不解的是,两幅早期作品在画面和唐卡背后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西藏元素,他们猜测是印度来的僧人在藏地绘制了与印度完全相同的作品。并指出,有关八大圣地的释迦牟尼事迹在这段时间的《般若波罗蜜多经》经卷插图中最为常见。P. Pal, *Himalayas an Aesthetic Adventure*, plate 121 p.187。

[17] 以往西藏艺术史学者认为,敦煌吐蕃风格的绘画集中出现在 9 世纪前后,晚唐一些密教窟室壁画中偶然能看到吐蕃波罗样式的遗风。可以确定的是,晚唐吐蕃成分是早期样式的遗留。假如把第 76 窟八塔变的年代判定在 10 或 11 世纪,那么意味着我们在敦煌 11 世纪前后的壁画中发现了在后弘期 11 至 12 世纪西藏艺术中才能看到的母题。

[18] 参看前引范成大《吴船录》:“新王舍城有兰若,隶汉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另外,印度菩提伽耶现有汉文碑铭五通,当为这些入印取经的僧人所立,年代正好在 11 世纪中叶:最早的碑或为道圆等所立,另三碑约为干兴二年(1022)建立,另一碑建于明道二年(1033)。参看沙畹(E. Chavannes), *Les inscriptions chinoises de Bodhi-Gaya* (菩提伽耶的中文碑铭),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34, 1, 1896, 58 p。

[19] 帕尔提到现今存世的有公元 9 世纪的贝叶经,但都没有任何插图,有《般若经》插图的贝叶经出现在 10 世纪末至 11 世纪初,至 13 世纪初逐渐消褪。Pratapaditya Pal & Julia Meech-Pekarik, *BUDDHIST BOOK ILLUMINATIONS*, Ravi Kumar Publishers, 1988, pp.45-50。

[20] 范成大著:《吴船录》“踰大山数重,至泥波罗国。又至磨逾里,过雪岭,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阶州。”此处的“三耶寺”是否与“桑耶寺”相关待考。

[21] 谢继胜著:《唐卡起源考》,《中国藏学》1996 年第 4 期。《大正藏》No.1191《文殊根本经》卷十一“广大画像

仪则曼拏罗成就法”。

[22] 《图画见闻志》卷六：“觉称画”云：大中祥符初（1008），有西域僧觉称来，馆于兴国寺之传法院，其僧通四十余本经论，年始四十余岁。丁晋公延见之，嘉其敏惠。后作《圣德颂》以上，文理甚富，上问其所欲，但云：“求金襴袈裟，归置金刚坐下。”寻诏尚方造以给之。觉称自言酤兰左国人，刹帝力姓，善画。尝于译堂北壁画释迦面，与此方所画绝异（昔有梵僧带过白氍毹上本，亦与寻常画像不同。盖西国所称，仿佛其真，今之仪相，始自晋戴逵。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画继》卷十“西天中印度那兰陀寺僧，多画佛及菩萨、罗汉像，以西天布为之。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带挂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画背，乃涂五彩于画面，以金或朱红作地，谓牛皮胶为触，故用桃胶，合柳枝水，甚坚渍，中国不得其诀也。邵太史知黎州，尝有僧自西天来，就公廨令画释迦，今茶马司有十六罗汉。”谢继胜《涉及吐蕃美术的唐宋画论》，《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另，宋初至景佑初年（1034）有80名入中土天竺僧进贝多罗叶经。

[23] 从印度取新样式携入中土是唐代佛教艺术的传统之一。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

菩萨像为样。”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记大相国寺“相蓝十绝”云：“西库有明皇先敕车道政往于阗国传北方毗沙门天王样来，至开元十三年封东岳时，令道政于此依样画天王像为一绝。”宋人当继承了这一传统。

[24] 拔塞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巴协》汉藏文本页135：“厢殿以外根据《涅槃经》绘制了八塔变。”skor khang kha phyir blta la mchod rten brgyad pa mya ngan las vdas pavi rgyud ris。12世纪成书的《第吾教法史》（Mkhas pa ldevus mdzad pavi rgya bod kyi chos vbyung rgyas pa/ 页349-350，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有不同的记载：记载了桑耶寺按照汉地风格建造的二层仓库（dkor-khang 或为 vkhor-khang 的笔误）壁画中有八塔：中间一层按照汉地式样修建，壁画绘有《大般若经》因缘故事。库房墙壁由外向内绘有八塔。（bar khang rgya nag lugs su bzhengs su gsol te/ / dkor khang kha phyir blta mchos rten brgyad pa dang/）

[25] 此地非张星烺所指为《大唐西域记》卷四记磨裕罗城（Mayura）。磨裕罗城在秣底补罗国，其地在北印度。张先生提到三耶寺或为桑耶寺，但与“磨逾里”形成地理位置的矛盾。参看王邦维《峨眉山继业三藏西域行程略笈释》，《南亚研究》1993年第2期。

王健秘书长会见尼泊尔中华寺原僧团成员

本刊讯 4月22日，中国佛教协会王健秘书长在广济寺大客厅亲切会见了日前从尼泊尔归国的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尼泊尔中华寺退居方丈怀善法师及尼泊尔中华寺原僧团成员。

王健秘书长首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怀善法师及尼泊尔中华寺原僧团成员圆满完成阶段性海外弘法任务回国表示热烈欢迎。王健秘书长说，尼泊尔中华寺是中国政府在境外修建的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佛教寺院。十余年来，以怀善法师为首的中华寺原僧团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使中华寺从无到有，为中华寺的建设和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加强中尼两国佛教界的交往与合作，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树立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后，王健秘书长勉励僧团成员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为不断发展的

佛教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怀善法师对王健秘书长的热情欢迎表示感谢，并对会领导的关怀和支持表示感谢。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自己在尼泊尔中华寺十余年的工作经历，表示能够在佛祖诞生地修行和工作是一件幸事，在中华寺工作和修行的十多年间，僧团成员都与尼泊尔中华寺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同时十分欢喜此次交接工作能够圆满完成。最后怀善法师表示：“身为佛子，当做佛事”，尼泊尔原僧团成员以后一定会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进取，为佛教弘法利生事业多做功德。

尼泊尔中华寺原僧团成员容一、容常、容念、容参等也先后发了言。

中国佛教协会演觉副秘书长，专委会办公室张开勤主任，寺庙办公室清远主任等参加了会见。

（刘东）

“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

供稿/谢继胜 文见P37



① 莫高窟第76窟东壁南侧,《八塔变》第一塔释迦降生、第三塔初转法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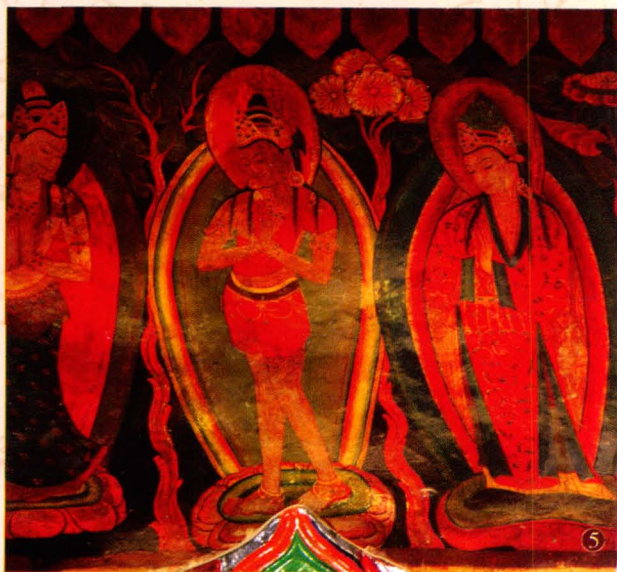


② 莫高窟第76窟东壁北侧,《八塔变》第五塔降服六师、第七塔猕猴献蜜



③④ 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局部胁侍菩萨与狮羊之一、之二

⑤ 后藏夏鲁寺马头殿11世纪波罗样式菩萨画像





⑥ 莫高窟第76窟，塔龕形制

⑦ 后藏艾旺寺塔龕形制



⑧ ⑨ 东印度比哈尔邦王舍城遗址出土八塔擦擦之一、之二

⑩ 东印度贝叶经释迦牟尼八大圣迹插图之一





⑪ 东印度贝叶经释迦牟尼八大圣迹插图之二

⑫ 东印度贝叶经释迦牟尼八大圣迹插图之腋下诞生

⑬ 东印度贝叶经释迦牟尼八大圣迹插图之腋下诞生局部

⑭ ⑮ 东印度贝叶经释迦牟尼八大圣迹插图之五、之六





⑬ ⑭ 东印度贝叶经释迦牟尼八大圣迹插图之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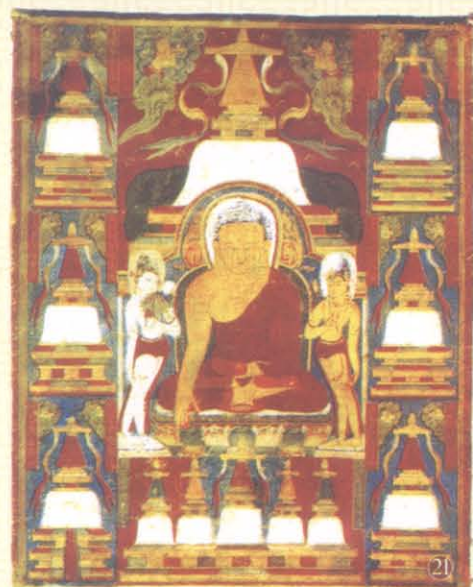
⑮ 东印度八塔八相石雕

⑯ 卫藏八塔变唐卡之一



“八塔经变画”与宋初中印文化交流

供稿/谢继胜 文见P37



- ① 14世纪尼泊尔佛传唐卡，是由早期八塔八相图发展而成的五方佛与密教着冠释迦牟尼佛传故事。
- ② 西夏时期的八塔成道唐卡，其一次纸印雕板刻本数量将近八万张。
- ③ 受到东印度波罗风格影响的西夏版画插图《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般若佛母，刻印年代为1167年。
- ④ 甘肃肃南马蹄寺崖壁西夏时期的噶当塔龕，这种塔龕式样在13世纪以后逐渐淡出。
- ⑤ 榆林窟3窟《八塔变》之“现大神通塔”。
- ⑥ 西夏时期八塔变成为整个洞窟壁画的中心，榆林窟3窟八塔变就位于该窟主壁的东壁中央。

